

## 論張衡〈南都賦〉與漢安帝時局的關聯性

許聖和

### 摘要

張衡的〈南都賦〉雖被收錄於《昭明文選》中，但對於此賦作於何時？為誰而作？因何而作？卻始終沒有很清楚地討論。本文即利用孟子「知人論世」之法，重新考察張衡與其擔任史官，並終始其朝的漢安帝時代，探究張衡在此期間所扮演的史官身分，對其創作〈南都賦〉有何影響？而《續漢書志》中的「日蝕」記載，屢屢出現「史官不記」、「史官不覺」之語，尤其是張衡擔任史官的漢安帝一朝，日蝕記錄為東漢列帝之冠，此一顯著的史官迴護筆法，對張衡寫作〈南都賦〉的心態影響，是本文主要探究的核心議題。

關鍵詞：張衡、〈南都賦〉、《續漢書志》、日蝕、筆法

---

\* 許聖和現職為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。

## 一、前言

對於張衡（78-139）〈南都賦〉作於何時？為誰而作？文本的主要功用為何等問題，一直都因為文獻不足，而無法有明確的結論。雖然過去研究多將其繫年於漢安帝時代（106-125），<sup>1</sup>學界也對《文選》李周翰「注」視此賦為針對漢桓帝（146-168 在位）欲廢南都所作的說法進行修正；<sup>2</sup>或視〈南都賦〉為張衡用以宣美故鄉之作，<sup>3</sup>具有方志性質的作品，<sup>4</sup>但南陽本是東漢光武帝的故鄉，其在東漢時代本就具有特殊的帝鄉地位，<sup>5</sup>因此張衡〈南都賦〉除具有「夫京殿苑獵，述行敘志，並體國經野，義尚光大」<sup>6</sup>的宣威慰國之效外，本文將試由漢安帝一朝之政局特點，來討論張衡於〈南都賦〉中「非苟尚辭而已，將以扭之王教，本乎勸戒也」之意圖。<sup>7</sup>

〈南都賦〉既被《文選》選入京都大賦之列，則其創作心態確實可由班固的〈兩都賦序〉來推敲：「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，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，雍容揄揚，著於後嗣，抑亦雅頌之亞也。」<sup>8</sup>其文本結構也符合京都大賦的文體特徵，<sup>9</sup>只是此對兩漢京都大賦體而言的普遍形式研究，<sup>10</sup>卻仍無法幫

<sup>1</sup> 這是目前對〈南都賦〉研究的共識，而首位將之繫於漢安帝時代者，應是孫文青於 1935 年出版的《張衡年譜》。可參考〔東漢〕張衡著，張震澤校注：《張衡詩文集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 年）。王渭清：《張衡詩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 年），頁 5-6。

<sup>2</sup> 〔唐〕李周翰云：「南都在南陽光武舊里，以置都焉。桓帝時議欲廢之，故衡作是賦，盛稱此都是光武所起處，又有上代宗廟以諷之。」見〔南朝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、呂延濟、劉良、張銑、李周翰、呂向注，俞紹初等校點：《新校訂六家注文選》（鄭州：鄭州大學出版社，2014 年），頁 199。錢志熙已對漢桓帝與張衡時代不同的客觀因素，否定此一說法。見氏著：〈張衡和他的南都賦〉，《文史知識》2008 年第 5 期，頁 69。

<sup>3</sup> 王志堯：〈氣勢恢弘的歷史文化名城禮讚——張衡〈南都賦〉賞析〉，《南都學壇》1990 年第 4 期，頁 87-92。

<sup>4</sup> 許結：〈賦的地理情懷與方志價值〉，《濟南大學學報》2005 年第 5 期，頁 45-50。王樹森：〈「賦志乘」說評議——以都邑賦為中心〉，《中國韻文學刊》2009 年第 1 期，頁 51-56。陶禹：〈漢晉都邑賦「方志性」的生成與演進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21 年第 1 期，頁 170-178。

<sup>5</sup> 劉德杰：〈論東漢皇帝的帝鄉意識及帝鄉意識下的文學活動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12 年第 3 期，頁 85-91。張露露：〈政治地理視域下的兩漢南陽郡研究〉（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，2020 年），頁 68-90。

<sup>6</sup> 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。〔南朝梁〕劉勰著，詹鏗義證：《文心雕龍義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，頁 283。

<sup>7</sup> 〔西晉〕皇甫謐：〈三都賦序〉，收於〔南朝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等注，俞紹初等校點：《新校訂六家注文選》，頁 2997。

<sup>8</sup> 〔東漢〕班固：〈兩都賦序〉，收於〔南朝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注，李培南等點校：《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），頁 3。

<sup>9</sup> 趙遠夫〈〈兩都賦〉的創作背景、體制及影響〉：「漢代京都賦除寫地理形勝、文物、禮制

助我們理解張衡寫作〈南都賦〉之目的。〈南都賦〉中雖有南陽耆老仰望「真人南巡」似乎透露出一種遷都意識，顯見張衡此賦具有國事參與的用意，<sup>11</sup>只是南陽從未是東漢討論定都之選擇，<sup>12</sup>因此〈南都賦〉的內容除了未明的遷都爭議外，顯然就文本結構觀之，「南巡」一事，應才是張衡作此賦的核心主旨。而只要能了解張衡何以強調「南巡」一事的時空背景與建議對象，則或可協助補白對〈南都賦〉一文的理解。

〈南都賦〉的文末對於「南巡」一事的描述：

方今天地之睢刺，帝亂其政，豺虎肆虐，真人革命之秋也。爾其則有謀臣武將，皆能攬戾執猛，破堅催剛。排捷陷烏，蹙蹈咸陽。高祖階其塗，光武攬其英。是以關門反距，漢德久長。及其去危乘安，視人用遷。周、召之儔，據鼎足焉，以庇王職。縉紳之輪，經綸訓典，賦納以言。是以朝無闕政，風烈昭宣也。於是乎鯢齒眉壽，鮐背之叟，皤皤然被黃髮者，喟然相與歌曰：「望翠華兮葳蕤，建太常兮袞袞。駟飛龍兮騏驎，振和鸞兮京師。總萬乘兮徘徊，按平路兮來歸。」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！<sup>13</sup>

李善分開解釋「方今」一詞，<sup>14</sup>導致其《注》將此處張衡所敘之建國史，並列漢高祖劉邦（西元前 202- 195 在位）與漢光武帝劉秀（25-57 在位）；五

之外，也還寫到宮殿、苑囿、田獵等。……似與《詩·小雅》之〈吉日〉、〈車攻〉二篇關係更密切。……都是以天子的行動為中心……也更能集中地、多角度、多方面地展現一個時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發展狀況，因而後世時有人加以模擬，形成『京都賦』的類型。」見氏著：《讀賦獻芹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），頁138-148。

- <sup>10</sup> 如許結於〈賦的補續與超越〉一文中所言：「漢賦就是『眾大之辭』，是對整個國家的文化寫照，……其中的『物態』與『德教』，奠定後世辭賦（尤其是體物大賦）創作，由『觀物』到『觀德』的書寫模式。」收於《古典文學知識》2019年第4期，頁122。李炳海：〈帝都中心論的文化承載——古代京都賦意蘊管窺〉，《齊魯學刊》2000年第2期，頁4-10。
- <sup>11</sup> 王欣慧：《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9年），頁25-37。
- <sup>12</sup> 東漢稱南陽為南都，僅出現在《東觀漢記·地理志》：「光武中興，都洛陽，又於南陽置南都。」見〔東漢〕劉珍等著，吳樹平校注：《東觀漢記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卷5，頁178。僅此一條，實在無法確定立南陽為南都的真實性。而《東觀漢記》的〈地理志〉部分，是伏無忌等人補續，已是漢桓帝時代的作品：「元嘉中，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、崔寔等共撰《漢記》。」見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伏湛傳附伏無忌傳》，收於楊家駱主編：《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》第1-4冊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3年），卷26，頁898。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也說：「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、王子、功臣、恩澤侯表，南單于、西羌傳，地理志。」見〔唐〕劉知幾著，劉占召評注：《史通》（北京：中央編譯社，2010年），卷12，頁299。
- <sup>13</sup> 〔東漢〕張衡著，張震澤校注：《張衡詩文集校注》，頁190-193。
- <sup>14</sup> 李善曰：「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『方，向也。』謂高祖之時。《蒼頡篇》曰：『今，時辭也。』」

臣注中的劉良也是如此，<sup>15</sup>但清代朱琦（1769-1850）合「方今」為「當今」之義，雖可通讀全段，而認為：「此宜統指王莽擾亂時，一氣直下。」<sup>16</sup>其在《文選集解》中還收錄了乾隆時代（1736-1795）的葉樹藩引朱超之云「帝亂其政」之「帝」為「漢成帝（西元前 33-7 在位）」，顯然對本賦的解讀，尚有將張衡文中的建國史，溯源至西漢成帝的荒政，導致日後王莽竊國（9-23 在位），才有東漢光武中興之機的方向。只是回到張衡的本文，朱琦等人的解釋在文本脈絡中並沒有出現，然此詮釋並非全不足取，其所採取的「外戚干政」觀點，若對應於〈南都賦〉常被繫之東漢安帝時代，確實也存在著外家干政與內宦亂朝的政治局勢。

《後漢書》卷 10〈皇后紀下·安思閭皇后〉：「后有才色，……甚見寵愛……（元初）二年，立為皇后。后專房妒忌，帝幸宮人李氏，生皇子保，遂鳩殺李氏。」<sup>17</sup>閭皇后得立後，不僅屠殺安帝血脈，閭氏一族亦雞犬升天：「建光元年，鄧太后崩，帝始親政事。顯及弟景、耀、晏並為卿校，典禁兵。延光元年，更封顯長社（縣）侯，食邑萬三千五百戶，追尊后母宗為滎陽君。顯、景諸子年皆童叢，並為黃門侍郎。后寵既盛，而兄弟頗與朝權……。」<sup>18</sup>可知，閭后一族是在鄧太后（105-121 在位）崩逝後，取代鄧后勢力，挾持漢安帝與朝政，更企圖在安帝暴崩之際封鎖消息，欲選立幼童為帝：「（延光四年三月）庚申，帝至宛，不豫。乙丑，帝發自宛；丁卯，至葉，崩於乘輿。年三十二。……（閭）太后欲久專國政，貪立幼年，與顯等定策禁中，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，立為皇帝。」<sup>19</sup>這也顯示出漢安帝接連遭到鄧太后與閭皇后等外戚勢力之把持，使其掌政能力為史家所嘲。<sup>20</sup>而其當初的繼位過程也充滿爭議，受到前朝鄧太后一族的扶持，漢和帝（88-106 在位）駕崩後，鄧皇后立僅有百日大的和帝少子劉隆（105-106）繼位，自己也成為太后專制朝政，但 8 個月後年僅週歲的漢殤帝（106 在位）早夭，鄧太后與其兄鄧騭定策禁中，立年僅 13 歲的漢章帝之孫劉祐為漢安

謂光武也。」〔南朝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等注，俞紹初等校點：《新校訂六家注文選》，頁 213。

<sup>15</sup> 劉良曰：「方，向也。向今，猶向時也。」同上註。

<sup>16</sup> 〔清〕朱琦：《文選集釋·南都賦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66 年），卷 5，頁 19。

<sup>17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皇后紀下·安思閭皇后》，卷 10，頁 435。

<sup>18</sup> 同上註，頁 436。

<sup>19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20</sup> 《敬齋古今艱》卷 3：「天地之氣，陰陽相半，曰暘曰雨，各以其時，則謂之和平；一有所偏，則謂之隔并。隔并者，謂陰陽有所閉隔，則或枯或潦，有所兼并也。安帝延光元年，陳忠上疏云：今天心未得，隔并屢臻。青、冀之域，或淫雨漏河；徐、岱之濱，海水盈溢；兗、豫則蝗蝻滋生；荊、揚則稻收斂薄。」〔元〕李冶著，劉德權點校：《敬齋古今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 年），頁 38。

帝，但這樣的繼位程序也令漢安帝蒙上正統性的爭議。<sup>21</sup>而漢安帝直到永寧 2 年（121）3 月鄧太后駕崩，同年 5 月鄧太后一族鄧鸞等人自殺，7 月改元建光，才開始親政，也就是說漢安帝自永初元年被立為帝，直到 15 年後的建光元年，才算是真正獨立自主的皇帝。

從以上外戚干政的背景，來觀察〈南都賦〉中所提到的「真人革命」之史事，所指雖為漢光武帝，且其中涉及漢高祖史事，乃為秦二世（西元前 210-207 在位）末年劉邦與秦將齧於南陽之戰，<sup>22</sup>這場戰役決定了劉邦的戰略優勢，南陽、宛城選擇向劉邦投降，不僅讓劉邦取得豐沛的後勤資源，南陽更成為其大後方的重要基地，使其無後顧之憂地西進咸陽，成為日後與項羽一爭天下的資本。因此，張衡用「階其塗」之意，正指南陽為漢高祖建立帝業的起點，而南陽也正是漢光武帝之帝鄉，這條脈絡正是讓其接續西漢正統性的重要指標。而這一正統軌跡正是迭遭外戚把持朝政的漢安帝，所亟需對外宣示帝位合理性的重要象徵。因此〈南都賦〉所描寫的史事，其內容若聯繫漢安帝政局情勢，則必可對〈南都賦〉之創作意圖加以補充。

雖然多數評論或研究的主張，都只以賦中對南陽城的方位結構、山河地景、物產種類等地誌式焦點，但此只能解釋〈南都賦〉就是《文選》中的一篇京都大賦傑作而已，卻無法深入理解張衡的作賦心態。本文則認為，若詮釋文本脫離賦家之心，是否能夠達到孟子所言「以意逆志」之效？故本文將對張衡所處之漢安帝時局作通盤考察，期能用知人論世之法，對〈南都賦〉的文本性質與作者意圖，作出詮解的補充。

## 二、《續漢志》中「日蝕」迴護筆法與漢安帝政局

《後漢書》卷 59〈張衡傳〉載：「安帝雅聞衡善術學，公車特徵拜郎中，再遷為太史令。遂乃研覈陰陽，妙盡璇機之正，作渾天儀，著《靈憲》、《筭罔論》，言甚詳明。順帝初，再轉，復為太史令。」<sup>23</sup>張衡進入朝廷任職的

<sup>21</sup> 《後漢書·孝安帝紀》載其即位詔：「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，皇太后曰：咨長安侯祐：孝和皇帝懿德巍巍，光于四海；大行皇帝不永天年。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，謙恭慈順，在孺而勤，宜奉郊廟，承統大業。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。其審君漢國，允執其中『一人有慶，萬民賴之。』皇帝其勉之哉！」其發語主辭實為鄧太后。見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 5，頁 204。

<sup>22</sup> 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「與南陽守騎戰犍東，破之。略南陽郡，南陽守騎走，保城守宛。沛公引兵過而西。張良諫曰：『沛公雖欲急入關，秦兵尚眾，距險。今不下宛，宛從後擊，彊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』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，更旗幟，黎明，圍宛城三市。」〔西漢〕司馬遷著，〔南朝宋〕裴駰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卷 8，頁 359。

<sup>23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頁 1897。

時間，乃是漢安帝於永初 2 年（108）所下的求賢詔，其中特別提及：「其百僚及郡國吏人，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機之數者，各使指變以聞。」<sup>24</sup>張衡此時為南陽太守鮑德之主簿已有 9 年，<sup>25</sup>又以「機術特妙」聞名，<sup>26</sup>故得以應聘此次公車徵才。而張衡也就在漢安帝、漢順帝父子時代的朝廷任職，尤其完全參與了漢安帝一朝之始末，因此對於這位於歷史上充滿負評的君王，<sup>27</sup>身處其時的張衡看法可能並非如此！

這個觀察可藉《續漢書志》中的《五行志》對「日蝕」的記載，於漢安帝時出現多次「史官不記」的記錄，而漢安帝時的史官中，就有以天文技術聞名的張衡，則這些史官不記的日蝕天象，應該可以判斷是張衡等史官有意為之。但日蝕在中國古典天文系統中，是專屬帝王施政的警示象徵，<sup>28</sup>故史官不可能無故不予記載，尤其像張衡就是以其天文知識聞名而受徵召進入朝廷，卻在其任職期間發生這麼多次不記日蝕之事，實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在《續漢書志》卷 18〈五行·六〉的 72 次日蝕記錄中，<sup>29</sup>共有 13 次載明史官不見與 1 次史官不覺的記載，分別是：漢光武帝 1 次；漢章帝（75-88 在位）1 次；漢和帝（88-106 在位）1 次；漢安帝 5 次；漢順帝 2 次、漢桓帝（146-168）4 次。日食之象，自漢文帝（西元前 180-157）以來即視為君德之徵，<sup>30</sup>故史官絕對會特別記錄。而這麼重大的天象，《續漢書志》中卻

<sup>24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人注：《後漢書》，頁 210。

<sup>25</sup> 《後漢書·鮑德傳》：「累官為南陽太守……在職九年，徵拜大司農，卒于官。」見《後漢書》，卷 29，頁 1023。而在張衡所作之〈綬筭銘序〉云：「南陽太守鮑德，有詔所賜先公綬筭，傳世用之。時德更治筭，衡時為德主簿……。」見〔東漢〕張衡著，張震澤校注：《張衡詩文集校注》，頁 313。據孫文青《張衡年譜》的考察，鮑德任南陽太守應該在和帝永元 12 年至安帝永初 2 年（100-108）之間。見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 29，頁 381-382。

<sup>26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左周黃列傳》，卷 61，頁 2042，「史臣論」。

<sup>27</sup> 《讀通鑑論·漢安帝》：「安帝之不德，豈至如昌邑王賀之荒悖哉！……鄧后以婦人而輔以碌碌之鄧騭，予奪在手，唯意所授，瀆大倫，玩神器，君子所必誅勿赦也。鄧后死，王聖、李閏乘權而亂政，由安帝之不君，可謂后之先識而志安社稷乎？」〔清〕王夫之：《讀通鑑論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，1982 年），卷 7，頁 224。

<sup>28</sup> 〔清〕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有「漢重日食」的分析。見氏著，王樹民校證：《廿二史劄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 年），頁 41。

<sup>29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六》，收於楊家駱主編：《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》第 5 冊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3 年），卷 18，頁 3357-3374。

<sup>30</sup> 《漢書·孔光傳》載孔光曰：「日者，眾陽之宗，人君之表，至尊之象。君德衰微，陰道盛彊，侵蔽陽明，則日蝕應之。」見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卷 81，頁 3359。

屢次出現史官不見或不覺之語，這在《史記》或《漢書》中是從未出現的事情。《偽古文尚書》有著羲和因怠忽職守漏失天象記錄，慘遭仲康征伐的故事，<sup>31</sup>雖為偽經，但透露出古代史官對天象曆時的管理責任，可知尤其像「日蝕」這樣重大的異常天象，史官不可能無視之。

如漢光武帝建武 6 年（30）的日蝕記載：「九月丙寅晦，日有蝕之。史官不見，郡以聞。在尾八度。」<sup>32</sup>而〈光武帝紀〉在此月有云：「秋九月庚子，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已下。」<sup>33</sup>但兩件事一在月初一在月底，關聯性似乎不大。劉昭在此《注》云：「朱浮上〈疏〉，以郡縣數代，羣陽騷動所致，日有蝕之。」<sup>34</sup>指的是《後漢書·朱浮傳》中所載其趁此次日蝕所提出的〈上疏〉，<sup>35</sup>勸諫光武帝對二千石的太守調動不要太頻繁，以免造成地方不安。但朱浮是在日蝕後才〈上疏〉，並且應是受光武帝對此次日蝕所發〈罪己詔〉而作：「吾德薄不明，寇賊為害，疆弱相陵，元元失所。《詩》云：『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』永念厥咎，內疚於心。其勅公卿舉賢良、方正各一人；百僚並上封事，無有隱諱；有司修職，務遵法度。」<sup>36</sup>兩漢帝王於日蝕出現時，本就常發「日蝕詔」來罪己宣示天下，<sup>37</sup>這也表示史官已經向漢光武帝稟告此一天象訊息，故史官對此次日蝕不可能不知，因此《續漢書·五行志·六》中所謂「史官不見」的說法，應該有其他涵義。

《續漢書志》中說此次日蝕在「尾八度」，指的是日蝕被觀測到的時間正好對應的地區，<sup>38</sup>按星宿分野，「尾宿」與「箕宿」對應之地在「燕、幽

<sup>31</sup> 〈胤征〉載：「惟時羲和，顛覆厥德，沈亂于酒。畔官離次，傲擾天紀，遐棄厥司。乃季秋月朔，辰弗集于房，瞽奏鼓，嗇夫馳，庶人走。羲和尸厥官，罔聞知，昏迷于天象，以干先王之誅。《政典》曰：『先時者殺無赦，不及時者殺無赦。』今予以爾有眾，奉將天罰。」屈萬里：〈附編三 偽古文尚書龔古簡注〉，《尚書集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1年），頁 311。

<sup>32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六》，卷 18，頁 3358。

<sup>33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頁 49。

<sup>34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六》，卷 18，頁 3358。

<sup>35</sup> 《後漢書·朱浮傳》載其上疏：「臣聞日者眾陽之所宗，君上之位也。凡居官治民，據郡典縣，皆為陽為上，為尊為長。若陽上不明，尊長不足，則干動三光，垂示王者。……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，迎新相代，疲勞道路。尋其視事日淺，未足昭見其職，既加嚴切，人不自保，各相顧望，無自安之心。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，苟求長短，求媚上意。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，懼於刺譏，故爭飾詐偽，以希虛譽。斯皆羣陽騷動，日月失行之應。」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 33，頁 1142。

<sup>36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頁 50。

<sup>37</sup> 蘇德昌：《漢書五行志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4年），頁 506-530。

<sup>38</sup> 陳久金：「二十八宿，就是天上月亮的二十八個宿舍，……若將月亮每晚行經的星座看成一個星宿，那麼月亮繞行一周，變為 27 或 28 個星宿。……日食和月食，都是與月亮有關

州」，<sup>39</sup>在《晉書》卷 11〈天文志上〉在此範圍內，自西而東排列的城市分別為：

涼州入箕中十度；  
 上谷入尾一度；  
 漁陽入尾三度；  
 右北平入尾七度；  
 西河、上郡、北地、遼西入尾十度；  
 涿郡入尾十六度；  
 渤海入箕一度；  
 樂浪入箕三度；  
 玄菟入箕六度；  
 廣陽入箕九度。<sup>40</sup>

可知「尾」、「箕」兩宿之分野範圍，還包括涼州與并州部分地區。而此次日蝕出現在「尾八度」，應該在右北平、西河、上郡、北地、遼西一帶。巧合的是，明年，即建武 7 年（31），3 月晦日又再一次出現日蝕，鄭興此時乃〈上疏〉：「夫日月交會，數應在朔，而頃年日食，每多在晦。先時而合，皆月行疾也。日君象而月臣象，君亢急則臣下促迫，故行疾也。……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，宜留思柔剋之政，垂意《洪範》之法。」<sup>41</sup>顯示這兩次日蝕，朝臣多由漢光武帝之厲政角度來解釋。然而史官的考量可能不只如此，〈五行志〉也記載著建武 7 年的日蝕，但這次則有詳細說明：「三月癸亥晦，日有蝕之，在畢五度。畢為邊兵。秋，隗囂反，侵安定。冬，盧芳所置朔方、雲中太守各舉郡降。」<sup>42</sup>由此可知，建武 6 年到 7 年間所發生的兩次日蝕之象，對史官而言，其實是因盧芳與隗囂的叛亂而起。

漢光武帝在建立政權後，至建武 13 年以前，各地軍閥割據勢力仍然兵強馬壯，各自為政，天下百姓實尚未歸心於一，<sup>43</sup>因此史官對於日蝕之象的

---

的特殊天象。」見氏著：《斗轉星移映神州——中國二十八宿》（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頁 1-3。

<sup>39</sup> 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：「東方曰蒼天，其星房、心、尾；東北曰變天，其星箕、斗、牽牛。」高誘注云：「房、心、尾，東方宿也。房、心，宋分野；尾、箕，燕分野。」見劉文典：《淮南鴻烈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 年），頁 87。

<sup>40</sup> 〔唐〕房玄齡等著：《晉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310。

<sup>41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鄭興傳》，卷 36，頁 1222。

<sup>42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六》，卷 18，頁 3358。

<sup>43</sup> 朱東潤：《後漢書考索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387-412。

解讀便要更加謹慎！若僅以君德不卒來解釋，勢必影響漢光武帝尚未穩固的王權合法性。

自稱為漢武帝之後的盧芳，<sup>44</sup>於建武 6 年受到匈奴的協助而佔有并州地區的五原、朔方、雲中、定襄、鴈門五郡稱王；<sup>45</sup>而以西北天水、涼州為根據地的隗囂，則是三輔父老士大夫爭相投奔歸順所認同的君主，<sup>46</sup>是以這一連串の日蝕異象所對應的分野地點，正好與這兩大軍閥的勢力範圍相關。

《續漢書志》引《日蝕說》：「日者，太陽之精，人君之象。君道有虧，有陰所乘，故蝕。蝕者，陽不克也。」<sup>47</sup>可知日蝕天象所對應的就是「帝王」，因此史官對日蝕的解釋，雖出於示警勸善，然此言論僅能對國君而發，則在此一脈絡下，史官對日蝕的解釋或記錄，實也隱含對帝王正統性的認同與維護。<sup>48</sup>故建武 6 年的日蝕，在幽州（光武）、并州（盧芳）、與涼州（隗囂）三雄鼎峙的狀態下，史官藉不記載日蝕以解消光武帝君德遭到質疑的壓力，防止讓盧芳與隗囂藉機大作文章而損害光武帝的正統性，但不代表史官未向光武帝報告此次異象，是以光武帝仍然發詔罪己，則是執行西漢君主故事的禮制行為，也等於是一種正統性的宣告。<sup>49</sup>

司馬彪在《續漢書志》中謂日蝕之象：「儒說諸侯專權，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。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，人君改修其德，則咎害除。」<sup>50</sup>可見，解釋日蝕的原因尚有諸侯專權的方向，其實西漢京房已提出 20 種君臣失序的狀態來做為日蝕的占法，其中如「公欲弱主位」、「君疾善，下謀上」、「弑

<sup>44</sup> 《後漢書·盧芳傳》：「王莽時，天下咸思漢德，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。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，生三子。遭江充之亂，太子誅，皇后坐死，中子次卿亡之長陵，小子回卿逃於左谷。霍將軍立次卿，迎回卿，回卿不出，因居左谷，生子孫卿，孫卿生文伯。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。」見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 12，頁 505-506。

<sup>45</sup> 同上註，頁 506。

<sup>46</sup> 《後漢書·隗囂傳》：「囂聞光武即位河北，……亡歸天水。復招聚其眾，據故地，自稱西州上將軍。及更始敗，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。」同上註，卷 13，頁 521。

<sup>47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六》，卷 18，頁 3357。

<sup>48</sup> 董仲舒：「陛下發德音，下明詔，求天命與情性，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。臣謹案《春秋》之中，視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觀天人相與之際，甚可畏也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，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異以警懼之，尚不知變，而傷敗乃至。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。自非大亡道之世者，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，事在彊勉而已矣。」見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，頁 2498。

<sup>49</sup> 陳侃理：〈中國古代關於日食災異的學術、禮儀與制度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 83 本第 3 分（2012 年 9 月），頁 391-400。

<sup>50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六》，卷 18，頁 3357。

君獲位」、「冢宰專政」、「受命之臣專征」、「諸侯更制」等等，<sup>51</sup>包含君權遭到侵陵之狀。但司馬彪仍舊嚴守自西漢以來，將日蝕異相的解釋歸諸帝王之原則，只是如東漢安帝以降，從登位到崩逝都受外戚與內宦掌控的傀儡處境，期間的日蝕異象若還是從君德失當來解釋，反而會讓漢安帝變成權臣的替罪羔羊！處在此種政治環境下的史官如張衡，採用不解釋日蝕原因的方式，反而可以作為維護漢安帝正統性之用。

對於漢安帝的日蝕異相，〈五行志〉嘗云：

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，日有蝕之，在胃二度。胃主廩倉。是時鄧太后專政，去年大水傷穀，倉廩為虛。<sup>52</sup>

永初5年又載：

正月庚辰晦，日有蝕之，在虛八度。正月，王者統事之正日也。虛，空名也。是時鄧太后攝政，安帝不得行事，俱不得其正，若王者位虛，故於正月陽不克也，示象也。於是陰預乘陽，故夷狄並為寇害，西邊諸郡皆至虛空。<sup>53</sup>

元初2年亦有：

九月壬午晦，日有蝕之，在心四度。心為王者，明久失位也。<sup>54</sup>

〈五行志〉中記錄漢安帝在位時出現日蝕就有12次，是東漢諸帝之冠，其中有9次是出現在鄧太后攝政時期，而從上述史官所論可知，漢安帝在此期間根本就是虛位元首，毫無任何政治實權，故日蝕所示警的不當施政，實際上的政治責任本不應歸咎漢安帝。如《後漢書》卷10〈皇后紀上·和熹鄧皇后〉即載：

及殤帝崩，太后定策立安帝，猶臨朝政。以連遭大憂，百姓苦役。<sup>55</sup>

《後漢書》卷16〈鄧騭傳〉也云：

殤帝崩，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，懼遷城門校尉，弘虎賁中郎將。自和帝崩後，騭兄弟常居禁中。……時遭元二之災，人士荒飢，死者相望，盜賊羣起，四夷侵畔。<sup>56</sup>

<sup>51</sup> [東漢]班固著，[唐]顏師古注：《漢書·五行志第七下》，卷27下之下，頁1479-1480。

<sup>52</sup> [西晉]司馬彪著，[南朝梁]劉昭注，[唐]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六》，卷18，頁3363。

<sup>53</sup> 同上註，頁3363。

<sup>54</sup> 同上註，頁3364。

<sup>55</sup> [南朝宋]范曄著，[唐]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頁423。

安帝自即位起，朝政就受到外戚鄧氏一族把持，故除了日蝕之外，其他天文異象之警識，史官也皆由鄧后干政的角度來解釋，如《續漢書志·天文志中》記載安帝永初元年5月出現「熒惑守心」的天象：

五月戊寅，熒惑逆行守心前星。……心為天子明堂，熒惑逆行守之，違反臣。……是時，安帝未臨朝，鄧太后攝政，鄧騭為車騎將軍，弟弘、悝、閭皆以校尉封侯，秉國勢。<sup>57</sup>

又永初3年：

正月庚戌，月犯心後星。……是時鄧氏方盛，月犯心後星，不利子。<sup>58</sup>

或是冰雹之災：

安帝永初元年，雨雹。二年，雨雹，大如雞子。三年，雨雹，大如鴈子，傷稼。劉向以為雹，陰脅陽也。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。<sup>59</sup>

以及水災：

時正月己亥，太白入北斗中，以為貴相凶也。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，鄧太后專政也。<sup>60</sup>

本來是針對皇帝施政所發的災異或天象示警，但在傀儡皇帝的狀態下，史官的詮釋全都指向鄧太后干政的方向，也可知面對這種虛權性的帝王，史官一方面要避免讓皇帝成為替罪羔羊，二方面又要維護其帝位正統性的詮釋難題。

就像在《續漢書志》中，對於「地震」的記載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，《續漢書志》於〈五行志四〉中記錄後漢地震一共720次，但光漢安帝一朝就出現361次，剛好佔五成比例！其中，若再細分以鄧太后崩逝的永寧2年（即建光元年）為分界，在此年以前總計發生250次地震記錄，爾後直到安帝崩殂尚有111次的，可以說整個漢安帝一朝，年年都伴隨著地震發

<sup>56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頁612-613。

<sup>57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天文中》，卷11，頁3238。

<sup>58</sup> 同上註，頁3239。

<sup>59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三》，卷15，頁3314。

<sup>60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安帝紀》，卷5，頁214。

生。<sup>61</sup>而按漢人對地震示警的解釋系統，地震象徵「陰勝陽」：「地者陰也，法當安靜。今乃越陰之職，專陽之政，故應之以動。」<sup>62</sup>李固的話被司馬彪載錄於漢安帝永初元年的地震災異裡，其評曰：「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，迄建光中，太后崩，安帝乃得制政，於是陰類並勝，西羌亂夏，連十餘年。」<sup>63</sup>司馬彪認為鄧太后過世後，漢安帝雖取得主政權，但卻仍「陰類並勝」，顯然是為了解釋安帝主政後仍然地震連連的原因，故在「建光元年」地震條下，司馬彪記載：「是時安帝不能明察，信宮人即阿母（王）聖等讒言，破壞鄧太后家，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，中常侍江京、樊豐等皆得用權。」<sup>64</sup>後代史家顯然將災異示警的對象一律指向漢代帝王，然若回到漢安帝時代的史官，多次日蝕紀錄不言不語，卻詳細記載其中的地震次數，這種筆法實已顯露出對漢安帝的保護與同情，如同京房對漢元帝的迴護之筆，<sup>65</sup>尤其若從漢人觀點可知：「日蝕地震，陽微陰盛也。臣者，君之陰也；子者，父之陰也；妻者，夫之陰也；夷狄者，中國之陰也。春秋日蝕三十六，地震五，或夷狄侵中國，或政權在臣下，或婦乘夫，或臣子背君父，事雖不同，其類一也。」<sup>66</sup>可知外戚干政往往被用來解釋地震之因，甚至結合日蝕以陰盛陽衰之氣化論來轉化帝王之責，如翼奉對漢元帝（西元前 48-33 在位）所言：「臣聞人氣內逆，則感動天地；天變見於星氣日蝕，地變見於奇物震動。……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，其後連月久陰，雖有大令，猶不能復，陰氣盛矣。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，必有異姓以明賢賢，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。同姓親而易進，異姓疏而難通，故同姓一，異姓五，乃為平均。今左右亡同姓，獨以舅后之家為親，異姓之臣又疏。二后之黨滿朝，非特處位，勢尤奢僭過度，呂、霍、上官足以卜之，甚非愛人之道，又非後嗣之長策也。陰氣之盛，不亦宜乎！」<sup>67</sup>二后之黨指的是許太后與王皇后外戚，《漢書》卷 9〈元帝紀〉：「（初元）三月，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。

<sup>61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四》，卷 16，頁 3327-3332。

<sup>62</sup> 同上註，頁 3328。

<sup>63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64</sup> 同上註，頁 3329。

<sup>65</sup> 《漢書·京房傳》：「建昭二年二月朔拜，上〈封事〉曰：『辛酉以來，蒙氣衰去，太陽精明，臣獨欣然，以為陛下有所定也。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。臣疑陛下雖行此道，猶不得如意，臣竊悼懼。……乃辛巳，蒙氣復乘卦，太陽侵色，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。己卯、庚辰之間，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。』」見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，卷 75，頁 3164。

<sup>66</sup> 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·杜周傳附杜欽傳》，卷 60，頁 2671，「杜欽上疏」。

<sup>67</sup> 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·翼奉傳》，卷 75，頁 3173-3174。

丙午，立皇后王氏。……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，奉戴侯後。」<sup>68</sup>又《漢書》卷 27 下〈五行志·地震〉引京房《易傳》曰「臣事雖正，專必震，其震，於水則波，於木則搖，於屋則瓦落。大經在辟而易臣，茲謂陰動，厥震搖政宮。大經搖政，茲謂不陰，厥震搖山，山出涌水。嗣子無德專祿，茲謂不順，厥震動丘陵，涌水出」。<sup>69</sup>可知翼奉所論元帝朝政之失，朝著許氏與王氏外戚以及石顯等佞臣專權的方向。又如漢成帝同時出現日蝕、地震之災異，梅福即由王鳳專權，外戚干政的角度分析之。<sup>70</sup>

是以，就漢人「日者眾陽之長，食者陰侵之徵」的概念觀之，<sup>71</sup>漢安帝朝史官若張衡等人，於日蝕記載一筆帶過，除寓有對外戚干政的不滿外，實也透露出迴護漢安帝之苦心。

### 三、〈南都賦〉與「元和故事」

永寧 2 年 3 月鄧太后崩逝後，漢安帝開始親政，也開啟一連串塑造自己正統性的象徵。

畢竟當初漢安帝能即位是受到鄧太后的謀劃：「安帝永初元年，大風拔樹。是時鄧太后攝政，以清河王子年少，號精耳，故立之，是為安帝。不立皇太子勝，以為安帝賢，必當德鄧氏也。」<sup>72</sup>漢和帝駕崩後，鄧太后立僅誕生百日的劉隆為漢殤帝，不及一年漢殤帝崩夭，鄧太后為求持續掌政，竟不顧漢和帝僅存的子嗣劉勝，而與其兄鄧鸞強立年僅 13 歲的清河王劉慶之子劉祐為帝：「及殤帝崩，群臣皆為屬意平原王勝。太后以前不立勝，恐為患，與車騎將軍鸞、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，其夜，使鸞持節以青蓋車以迎祐於清河邸。」<sup>73</sup>可見，漢安帝自即位以來便受到正統性的質疑。雖然有司空周章等人謀劃擁立劉勝，<sup>74</sup>但也無法阻止早已布局執政優勢的鄧

<sup>68</sup> 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·元帝紀》，卷 9，頁 279。

<sup>69</sup> 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·五行志·地震》，卷 27 下，頁 1452。

<sup>70</sup> 《漢書·梅福傳》：「建始以來，日食地震，以率言之，三倍春秋，水災亡與比數。陰盛陽微，金鐵為飛，此何景也！漢興以來，社稷三危。呂、霍、上官皆母后之家也，親親之道，全之為右，當與之賢師良傅，教以忠孝之道。今乃尊寵其位，授以魁柄，使之驕逆，至於夷滅，此失親親之大者也。」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，卷 67，頁 2922。

<sup>71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馬嚴傳》，卷 24，頁 860。

<sup>72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·四》，卷 16，頁 3335。

<sup>73</sup> 〔東晉〕袁宏著，周天游校注：《後漢記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 年），頁 427。

<sup>74</sup> 《後漢書·周章傳》：「初，和帝崩，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，不可奉承宗廟，貪殤帝孩抱，養為己子，故立之，以勝為平原王。及殤帝崩，羣臣以勝疾非痼，意咸歸之，太后以前既不立，恐後為怨，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，是為安帝。章以眾心不附，遂密謀閉宮門，

后一族，范曄即認為周章的莽撞行事，等於自投羅網遭鄧太后以叛亂之名，完全斬斷漢和帝血胤延續的機會。<sup>75</sup>即使漢安帝是漢章帝第八子清河王劉慶之子，然其既位過程的政爭風波，也令正統性的質疑始終籠罩著漢安帝一朝。在鄧太后崩逝不久，即在當月月底，漢安帝便追尊自己的親生父母與祖母：「三月戊申，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，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，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。……丁巳，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。」<sup>76</sup>清河王劉慶本是漢章帝的太子，其母宋貴人受竇皇后嫉妒讒害而死，劉慶更遭誣行厭勝之術而被章帝廢黜，在竇皇后的操作下讓其弟劉肇繼任太子，即為後來的漢和帝。漢安帝要重申自己的正統性，勢必藉其父本為漢章帝太子一事，以使自己所承帝緒能源自漢章帝，也順帶甩開鄧太后扶植其位的陰影。因此，清河王妃耿氏被迫封為皇貴妃，就是漢安帝為了要樹立自己在朝廷的政治勢力：「安帝始親政事，追感祖母宋貴人，悉封其家。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。」<sup>77</sup>但也讓漢安帝後期反受到閭皇后一族、耿寶、與宦官江京、樊豐等人干擾朝政。<sup>78</sup>而除了追封晉爵外，漢安帝也在延光3年起，進行「巡狩」之禮，並遵奉「元和故事」。《續漢書志·祭祀志中》：

延光3年，上東巡狩，至泰山，柴祭，即祠汶上明堂，如元和2年故事。<sup>79</sup>

但《續漢書志》中的「元和故事」，按史文脈絡觀之，乃漢章帝元和2年的東巡至泰山祭祀的典制：

（元和二年）二月，上東巡狩，將至泰山，道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。上至泰山，修光武山南壇兆。辛未，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。壬申，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，光武帝配，如雒陽明堂禮。癸酉，更告祀高祖、太宗、世宗、中宗、世

---

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、蔡倫，劫尚書，廢太后於南宮，封帝為遠國王，而立平原王。事覺，勝策免，章自殺。」見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33，頁1157-1158。

<sup>75</sup> 范曄論曰：「周章身非負圖之託，德乏萬夫之望，主無絕天之豐，地有既安之執，而創慮於難圖，希功於理絕，不已悖乎！」同上註，頁1158。

<sup>76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安帝紀》，卷5，頁232。

<sup>77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翟酺傳》，卷48，頁1602。

<sup>78</sup> 《後漢書·宦者列傳》：「太后崩，（帝）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，封（李）閭雍鄉侯；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，初迎帝於邸，以功封都鄉侯，食邑各三百戶。閭、京並遷中常侍，江京兼大長秋，與中常侍樊豐、黃門令劉安、鈞盾令陳達及王聖、聖女伯榮扇動內外，競為侈虐。又帝舅大將軍耿寶、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，遂枉殺太尉楊震，廢皇太子為濟陰王。」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78，頁2514。

<sup>79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祭祀中》，卷8，頁3187。

祖、顯宗於明堂，各一大牢。卒事，遂親東后。饗賜王侯羣臣。因行郡國，幸魯，祠東海恭王，及孔子、七十二弟子。四月，還京都。庚申，告至，祠高廟、世祖，各一特牛。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，各以其月祀而奏之。<sup>80</sup>

然在漢章帝之前，漢光武帝與漢明帝皆有過東巡之舉，尤其漢光武帝還舉行封禪大典：

（建武三十年張純上書曰）「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，平海內之亂，修復祖宗，撫存萬姓，天下曠然，咸蒙更生，恩德雲行，惠澤雨施，黎元安寧，夷狄慕義。《詩》云：『受天之祜，四方來賀。』今攝提之歲，倉龍甲寅，德在東宮。宜及嘉時，遵唐帝之典，繼孝武之業，以二月東巡狩，封于岱宗，明中興，勒功勳，復祖統，報天神，禪梁父，祀地祇，傳祚子孫，萬世之基也。」中元元年，帝乃東巡岱宗，以純視御史大夫從。<sup>81</sup>

而漢明帝東巡，據本紀記載，也有 3 次，分別是「永平五年冬十月，行幸鄴」、「永平六年冬十月，行幸魯」、「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，東巡狩」。第一次僅記載與趙王栩見面，<sup>82</sup>第二次則有「祠東海恭王陵」的安排，<sup>83</sup>第三次東巡狩，不僅有籍田禮、祠宗室、祭孔，並於孔宅講經。<sup>84</sup>其實漢明帝執政期間共計 7 次巡狩，都具備宣國威、祭先王、察民政的內容，如同班固〈東都賦〉所言：

至于永平之際，重熙而累洽，盛三雍之上儀，修袞龍之法服，敷洪藻，信景鑠，揚世廟，正予樂。人神之和允洽，君臣之序既肅。乃動大路，遵皇衢，省方巡狩，窮覽萬國之有無，考聲教之所被，散皇明以燭幽。<sup>85</sup>

張衡在〈東京賦〉裡也如此記載：

於是陰陽交和，庶物時育。卜征考祥，終然允淑。乘輿巡乎岱嶽，勸稼穡於原陸。同衡律而壹軌量，齊急舒於寒燠。省幽明以黜陟，乃反旆而迴復。望先帝之舊墟，慨長思而懷古！俟閭風而西遐，

<sup>80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祭祀中》，頁 3183-3184。

<sup>81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張純傳》，卷 35，頁 1197。

<sup>82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明帝紀》，卷 2，頁 108。

<sup>83</sup> 同上註，頁 110。

<sup>84</sup> 同上註，頁 118。

<sup>85</sup> 〔南朝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等注，俞紹初等校點：《新校訂六家注文選》，頁 48-49。

致恭祀乎高祖。既春遊以發生，啟諸蟄於潛戶。度秋豫以收成，觀豐年之多稔，嘉田畷之匪懈，行致賚於九扈。左瞰暘谷，右睨玄圃。眇天末以遠期，規萬世而大摹。且歸來以釋勞，膺多福以安念。總集瑞命，備致嘉祥。<sup>86</sup>

可知，「巡狩大典」確實是東漢各帝時常舉辦的重大禮儀，除了「觀諸侯、觀風俗」之外，<sup>87</sup>尚可「咸有告祀、答響休符」天命正統宣告，<sup>88</sup>而所謂的「元和故事」，乃是指「元和中，肅宗始修古禮，巡狩方岳」。<sup>89</sup>可知漢章帝應該是將東漢歷代巡狩儀典加以整理，成為後來東漢帝王執行的規範。<sup>90</sup>

永初 9 年 8 月癸酉，漢章帝發〈改元詔〉：「朕道化不德，吏政失和，元元未諭，抵罪於下。寇賊爭心不息，邊野邑屋不修。永惟庶事，思稽厥衷，與凡百君子，共弘斯道。中心悠悠，將何以寄？其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。」<sup>91</sup>顯然是因為邊境不寧，才決定改元。<sup>92</sup>而就在改元後，隨即進行「南巡」：

（八月）丁酉，南巡狩，詔所經道上，郡縣無得設儲峙。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。有遣使奉迎，探知起居，二千石當坐。其賜鰥、寡、孤、獨、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……辛丑，幸章陵，祠舊宅園廟，見宗室故人，賞賜各有差。冬十月己未，進幸江陵，詔廬江太守祠南嶽，又詔長沙、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、舂陵節侯、鬱林府君。還，幸宛。十一月己丑，車駕還宮，賜從者各有差。<sup>93</sup>

<sup>86</sup> 〔東漢〕張衡著，張震澤校注：《張衡詩文集校注》，頁 152。

<sup>87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祭祀中·六宗》，卷 8，頁 3184。

<sup>88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丁鴻傳》，卷 37，頁 1264。

<sup>89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，卷 52，頁 1718。

<sup>90</sup> 見〔宋〕徐天麟：《嘉禮·巡狩》，《東漢會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 年），卷 6，頁 54-56。

<sup>91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章帝紀》，卷 3，頁 146-147。

<sup>92</sup> 《後漢書·西羌傳》對於漢章帝朝邊境羌族叛亂有詳細的描述：「肅宗建初元年，安夷縣吏略妻卑湊種羌婦，吏為其夫所殺，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，種人恐見誅，遂共殺延，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。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，與卑湊等戰，斬首虜數百人。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，居安夷。二年夏，迷吾遂與諸眾聚兵，欲叛出塞。金城太守郝崇追之，戰於荔谷，崇兵大敗，崇輕騎得脫，死者二千餘人。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，吳棠不能制，坐徵免。武威太守傅育代為校尉，移居臨羌。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、漢陽，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，長水校尉耿恭副，討破之。於是臨洮、索西、迷吾等悉降。防乃築索西城，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，悉復諸亭候。至元和三年，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。」顯然，直到元和 3 年，羌亂愈演愈烈。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 87，頁 2881。

<sup>93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章帝紀》，卷 3，頁 147。

首先，漢章帝要求南巡路徑不得有任何官員率百姓貢奉，任何官員也不得請安問陞，否則將嚴懲。而抵達南陽後進行一連串的祭祀活動，其中「章陵」是漢光武帝的祖墳：「建武二年，以皇祖、皇考墓為昌陵，置陵令守視；後改為章陵，因以舂陵為章陵縣。」<sup>94</sup>而「零陵」則是光武祖系長沙定王劉發之初封地：

劉敞曾祖節侯買，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，為舂陵侯。敞父仁嗣侯，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，以舂陵地勢下濕，有山林毒氣，難以久處，上書願減戶徙南陽，留男子昌守墳墓，元帝許之。初元四年，徙南陽之白水鄉，猶以舂陵為國名，<sup>95</sup>

可見「章陵」對東漢朝廷有著「帝鄉祖祠」之意義，漢光武帝建武 6 年即詔令：「春正月丙辰，改舂陵鄉為章陵縣。世世復徭役，比豐、沛，無有所豫。」<sup>96</sup>而漢光武帝於建武 2 年，尚在軍閥戰亂時，即建立臨時的祖廟祭儀：「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。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，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。」<sup>97</sup>而漢章帝之前，「南巡祠章陵」的儀典應該尚未被文字整理，因此漢光武帝於建武 11 年：「三月己酉，幸南陽；還，幸章陵，祠園陵。」<sup>98</sup>又建武 17 年：「冬十月甲申，幸章陵。脩園廟，祠舊宅，觀田廬，置酒作樂，賞賜。」<sup>99</sup>漢明帝則在永平 10 年（67）：「閏月甲午，南巡狩，幸南陽，祠章陵。日北至，又祠舊宅。禮畢，召校官弟子作雅樂，奏《鹿鳴》，帝自御塤箎和之，以娛嘉賓。」<sup>100</sup>可見在漢章帝以前，只有回到宗廟與祖宅祭祀<sup>101</sup>，漢明帝還多了一次音樂演奏表演，透露出儀典程序的不固定性。而從上引漢章帝元和初年的南巡記錄可知，漢章帝除了祭祀祖宅與宗廟外，還命令廬江太守祭南嶽、長沙與零陵太守代祭長沙定王、舂陵節侯、鬱林府君在當地的祠廟，而回駕沿途接見與賞賜宗室故人，在大約二個月的時間完成整個南巡禮典。

<sup>94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宗室四王三侯列傳·城陽恭王祉傳》，卷 14，頁 562。

<sup>95</sup> 〔東漢〕劉珍等著，吳樹平校注：《東觀漢記校注》，頁 232。

<sup>96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下》，卷 1 下，頁 47。

<sup>97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祭祀中》，卷 8，頁 3193-3194。

<sup>98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下》，卷 1 下，頁 57。

<sup>99</sup> 同上註，頁 68。

<sup>100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明帝紀》，卷 2，頁 113。

<sup>101</sup> 《續漢書志注》引如淳曰：「宗廟在章陵，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。不使侯王祭者，諸侯不得祖天子，凡臨祭宗廟，皆為侍祠。」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》，頁 3194

爾後的東漢歷代君主，大致沿循漢章帝的南巡路線與禮典，如漢和帝：

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，南巡狩，清河王慶、濟北王壽、河間王開並從。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、三老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，各有差。……冬十月戊申，幸章陵，祠舊宅。癸丑，祠園廟，會宗室於舊廬，勞賜作樂。戊午，進幸雲夢，臨漢水而還。十一月甲申，車駕還宮，賜從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錢布，各有差。<sup>102</sup>

漢桓帝於延熹 7 年也有過一次南巡章陵之舉：

冬十月壬寅，南巡狩。庚申，幸章陵，祠舊宅，遂有事于園廟，賜守令以下各有差。戊辰，幸雲夢，臨漢水；還，幸新野，祠湖陽、新野公主、魯哀王、壽張敬侯廟。<sup>103</sup>

漢桓帝另再加上祭祀漢光武帝之兄、姊與舅父之宗廟，顯然已又增補了元和故事的政治慣例。因此，雖然《續漢書志》所謂「元和故事」乃列於東巡祠泰山的祭祀禮典之下，不過就漢章帝而言，「巡狩」本身「聲宣政教」與「追祖溯宗」的政治意義，更具備宣示王權正統的功能。<sup>104</sup>故對漢安帝來說，巡狩天下本就有宣示王權的政治目的，而遵循漢章帝所整理過後的巡狩儀典，也具有自己延續漢章帝血胤嗣統的象徵，而這也就是漢安帝特別強調「元和故事」的重要內涵。

故其自親政後也開始密集地巡狩天下：

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，東巡狩。……辛卯，幸太山，柴告岱宗。……壬辰，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。……三月戊戌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。<sup>105</sup>

其祭祀內容及程序與元和 2 年漢章帝的儀典相當吻合。又同年冬 10 月，漢安帝行幸長安：

壬午，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。丁亥，會三輔守、令、掾史於長安，作樂。閏月乙未，祠高廟，遂有事十一陵，歷觀上林、昆明

<sup>102</sup> [南朝宋] 范曄著，[唐] 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和帝紀》，卷 4，頁 191。

<sup>103</sup> [南朝宋] 范曄著，[唐] 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桓帝紀》，卷 7，頁 313。

<sup>104</sup> 《後漢書·孝章帝紀》：「朕惟巡狩之制，以宣聲教，考同遐迹，解釋怨結也。今『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』，駕言出游，欲親知其劇易。前祠園陵，遂望祀華、霍，東柴岱宗，為人祈福。今將禮常山，遂徂北土，歷魏郡，經平原，升踐隄防，詢訪耆老，咸曰『往者汴門未作，深者成淵，淺則泥塗』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，底績遠圖，復禹弘業，聖跡滂流，至于海表。」[南朝宋] 范曄著，[唐] 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卷 3，頁 154。

<sup>105</sup> [南朝宋] 范曄著，[唐] 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安帝紀》，卷 5，頁 238。

池。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，以中牢祠蕭何、曹參、霍光。十一月乙丑，至自長安。<sup>106</sup>

這個過程也與漢章帝建初 7 年的西巡儀典相當一致：

冬十月癸丑，西巡狩，幸長安。丙辰，祠高廟，遂有事十一陵。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，以中牢祠蕭何、霍光。……又幸長平，御池陽宮，東至高陵，造舟於涇而還。每所到幸，輒會郡縣吏人，勞賜作樂。十一月，詔勞賜河東守、令、掾以下。十二月丁亥，車駕還宮。<sup>107</sup>

只不過這次西巡早在建初年間，雖然不算「元和故事」，但已可見漢章帝一朝的禮典，就是漢安帝親政後，最重要的政治範例。

因此在延光 4 年 2 月，漢安帝舉行南巡大典：

二月甲辰，南巡狩。……三月庚申，幸宛，帝不豫。辛酉，令大將軍耿寶行太尉事。祠章陵園廟，告長沙、零陵太守，祠定王、節侯、鬱林府君。乙丑，自宛還。丁卯，幸葉，帝崩于乘輿，年三十二。祕不敢宣，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。<sup>108</sup>

漢安帝雖在葉城崩逝，但閻皇后、耿寶等人密不發喪，繼續完成南巡的祭祀行程，其內容也遵照漢章帝元和故事的程序。雖然史書所載往往偏向閻皇后等外戚干政的私心作祟，但若處在祕不發喪的狀態下，天下臣民就會以為漢安帝仍持續進行巡狩大典，其王權宣示的效用依舊存在，而南巡回到章陵祭祀宗廟，並完全延續漢章帝的禮典程序，則更能彰顯漢安帝的帝緒正統性。

故從任職太史的張衡替漢安帝所擬之〈東巡誥〉，可看出其代王所言：「展聖義于巡狩，喜圻時而詠八荒。」<sup>109</sup>急切帝宣示親政後的王權威信，雖然南巡未竟全功而中途崩殂，但由其希藉「元和故事」：「舉先王之大禮，假于章陵。」<sup>110</sup>來強化自己與漢章帝的正統連結，實正出於遭受鄧太后干政而帝位若虛的心理。

<sup>106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安帝紀》，頁 240。

<sup>107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章帝紀》，卷 3，頁 144。

<sup>108</sup>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安帝紀》，卷 5，頁 241。

<sup>109</sup> 〔東漢〕馬融：〈東巡頌〉，收於〔清〕嚴可均輯：《全後漢文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 年），頁 178-179。

<sup>110</sup> 〔東漢〕崔駰：〈南巡頌〉，收於〔清〕嚴可均輯：《全後漢文》，頁 445-446。

是以，張衡所作〈南都賦〉，若從此一政治局勢脈絡觀之，可視為其提供漢安帝重建正統宣示的禮典文本，如在賦中提及：

及其紉宗綏族，禴祠蒸嘗。以速遠朋，嘉賓是將。揖讓而升，宴於蘭堂。<sup>111</sup>

這裡提及南巡中與南陽父老的歡宴，實際上在漢光武帝建武 19 年南巡時也有同樣的流程：「秋九月，南巡狩。壬申，幸南陽，進幸汝南南頓縣舍，置酒會，賜吏人，復南頓田租歲。父老前叩頭言：『皇考居此日久，陛下識知寺舍，每來輒加厚恩，願賜復十年。』」<sup>112</sup>而漢明帝永平 10 年南巡也有：「召校官弟子作雅樂，奏《鹿鳴》，帝自御塤箎和之，以娛嘉賓。還，幸南頓，勞饗三老、官屬。」<sup>113</sup>上述活動必然也都會出現在漢章帝整理古禮以定制的文獻中，是以張衡〈南都賦〉除具備賦體所應有的禮制文本特質外，其所云：「曜朱光於白水，會九世而飛榮。」李周翰注曰：「漢火德，故言耀朱光也。光武，高祖九代孫，故謂之九世飛榮也。」也因為在此已經提及東漢光武帝延續高祖胤緒以建國，因此張衡在賦中所稱的「真人革命」，所指的對象便非李善注或五臣注所稱的高祖、光武革命之秋，其所謂的「真人」應該指的是漢安帝，故於賦中才特別強調追思祖宗之意：「於其宮室，則有園廬舊宅，隆崇崔嵬。御房穆以華麗，連閣煥其相徽。聖皇之所逍遙，靈祇之所保綏。章陵鬱以青蔥，清廟肅以微微。皇祖歆而降福，彌萬祀而無衰。帝王臧其擅美，詠南音以顧懷。」張銑在注中便說：「言光武善我此地，專擅天下之美，猶鐘儀操南音，不忘於本。」即使字句釋義不見得符合張衡本意，但其以追本溯源的解讀方向，卻無意間提供了本賦對漢安帝具有宣告胤嗣正統的含意，故在賦末的頌文云：

皇祖止焉，光武起焉。據彼河洛，統四海焉。本枝百世，位天子焉。永世克孝，懷桑梓焉。真人南巡，覩舊里焉。<sup>114</sup>

張衡即很明顯地連結漢高祖、漢光武帝的帝緒傳統，故此處的真人，就是漢安帝的代稱，則本賦的寫作時代應可繫於建光元年至延光 3 年之間，也可合理推論，因為張衡上〈南都賦〉，才使得延光 4 年一開春漢安帝即決定南巡，除了有漢章帝的禮制範例外，還有著潤色鴻業的宣示文本，實足以讓此次南巡順利完成其重建帝緒正統的宣示效果。

<sup>111</sup> [東漢]張衡著，張震澤校注：《張衡詩文集校注》，頁 180。

<sup>112</sup> [南朝宋]范曄著，[唐]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下》，卷 1 下，頁 71。

<sup>113</sup> [南朝宋]范曄著，[唐]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·孝明帝紀》，卷 2，頁 113。

<sup>114</sup> [東漢]張衡著，張震澤校注：《張衡詩文集校注》，頁 193。

#### 四、結論

東漢一朝，並沒有出現「南都」之稱，因此張衡所作之〈南都賦〉，其所謂「南都」之意，應該較貼近於顧炎武（1613-1682）所謂「以郡治為都」的定義，<sup>115</sup>但南陽在東漢時代本來就是帝鄉之地，對當代人而言本就有特殊意義，故張衡〈南都賦〉應不僅為宣美故鄉而作。若繫其作〈南都賦〉的時段於漢安帝在位期間，由〈南都賦〉末段藉南陽父老之口顯露出對漢帝南巡之急切渴望，若考察漢安帝一朝的政治情勢後，這是只能在鄧太后崩逝，漢安帝親政後才有可能出現的訴求。

漢安帝在後代史評中是有名的昏君，但若綜合其在位期間：「外羌戎，內盜賊，外戚、阿母、宦寺，交相煽搆，此大人搏撻幹運見功之地。」<sup>116</sup>如此險惡的政治局勢，身處當代的史家可能所見的漢安帝處境，會更能體會其中的身不由己。而張衡在漢安帝於南巡中崩逝的消息，甚至覺得事有蹊蹺：「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，民多病死，死有滅戶。人人恐懼，朝廷焦心，以為至憂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，思任防救，未知所由，夙夜征營。臣聞國之大事在祀，祀莫大於郊天奉祖。方今道路流言，僉曰：『孝安皇帝南巡路崩，從駕左右行憲之臣欲徵諸國王子，故不發喪，衣車還宮，偽遣大臣，並禱請命。』臣處外官，不知其審，然尊靈見罔，豈能無怨！」<sup>117</sup>張衡認為漢安帝終始一生皆受到外戚宦豎的干政侵擾，故在其崩殂後面對京師瘟疫流行，史官仍舊將矛頭指向閹后一族，則更加凸顯出漢安帝身不由己的政治困境。

因此，身為漢安帝朝的史官，對其朝政的評論視角，勢必也與後代不同。故本文藉由漢安帝時代多次出現日蝕異象被一筆帶過的記錄，推敲這可能是當時如張衡一樣的史官群，對根本只是虛位元首的漢安帝一種迴護式的筆法。

太陽象徵帝王，因此日蝕異象只能用在解釋帝王施政錯誤，但如此也就意味著帝王需負起政治責任，然漢安帝一朝絕大時段皆受到鄧太后外戚勢力把持，因此當日蝕出現，史官不願將施政舉措的責任歸於漢安帝，相較於象徵陰勝陽的地震災異記錄，則被詳細地記載，這一來一往透露出史官欲迴護漢帝的心態已不言而喻。同屬史官成員的張衡，應該也對此種政

<sup>115</sup> 《日知錄·都》：「《後漢書·安帝紀》：『徙金城郡，都襄武。』《龐參傳》：『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，始復得還都令居。』是以郡治為都。」見〔清〕顧炎武著，〔清〕黃汝成集釋：《日知錄集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卷22，頁1252。

<sup>116</sup> 〔清〕王夫之：《讀通鑑論》，頁223。

<sup>117</sup>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·五行志·五》，卷17，頁3350。

治局勢了然於心，故張衡對於漢安帝親政後，急切地想要建立帝緒正統的心理感同身受，故才有代筆王言的〈東巡誥〉出現，而鼓吹南巡的〈南都賦〉，也就必然是在此一脈絡下的作品。

## 徵引文獻

### 專著

- 〔西漢〕司馬遷著，〔南朝宋〕裴駟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- 〔東漢〕班固著，〔唐〕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- 〔東漢〕張衡著，張震澤校注：《張衡詩文集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〔東漢〕劉珍等著，吳樹平校注：《東觀漢記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。
- 〔西晉〕司馬彪著，〔南朝梁〕劉昭、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續漢書志》，收入楊家駱主編：《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》第5冊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3年。
- 〔東晉〕袁宏著，周天游校注：《後漢記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。
- 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收入楊家駱主編：《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》第1-4冊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3年。
- 〔南朝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注，李培南等點校：《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〔南朝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等注，俞紹初等校點：《新校訂六家注文選》，鄭州：鄭州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〔南朝梁〕劉勰著，詹鍔義證：《文心雕龍義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〔唐〕房玄齡等著：《晉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- 〔唐〕劉知幾著，劉占召評注：《史通》，北京：中央編譯社，2010年。
- 〔宋〕徐天麟：《東漢會要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。
- 〔元〕李冶著，劉德權點校：《敬齋古今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。
- 〔清〕顧炎武著，〔清〕黃汝成集釋：《日知錄集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〔清〕王夫之：《讀通鑑論》，臺北：漢京文化出版社，1982年。
- 〔清〕趙翼著，王樹民校證：《廿二史劄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。
- 〔清〕朱珔：《文選集釋》，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66年。

- 〔清〕嚴可均輯：《全後漢文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。
- 王涓清：《張衡詩文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朱東潤：《後漢書考索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屈萬里：《尚書集釋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1年。
- 陳久金：《斗轉星移映神州——中國二十八宿》，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趙逵夫：《讀賦獻芹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。
- 劉文典著：《淮南鴻烈集解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蘇德昌：《漢書五行志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4年。

### 期刊與專書論文

- 王志堯：〈氣勢恢弘的歷史文化名城禮讚——張衡〈南都賦〉賞析〉，《南都學壇》1990年第4期。
- 王樹森：〈「賦代志乘」說評議——以都邑賦為中心〉，《中國韻文學刊》2009年第1期。
- 李炳海：〈帝都中心論的文化承載——古代京都賦意蘊管窺〉，《齊魯學刊》2000年第2期。
- 許結：〈賦的地理情懷與方志價值〉，《濟南大學學報》2005年第5期。  
——：〈賦的補續與超越〉，《古典文學知識》2019年第4期。
- 陳侃理：〈中國古代關於日食災異的學術、禮儀與制度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83本第3分，2012年9月。
- 陶禹：〈漢晉都邑賦「方志性」的生成與演進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21年第1期。
- 劉德杰：〈論東漢皇帝的帝鄉意識及帝鄉意識下的文學活動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12年第3期。
- 錢志熙：〈張衡和他的南都賦〉，《文史知識》2008年第5期。

### 學位論文

- 王欣慧：《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》，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9年。
- 張露露：《政治地理視域下的兩漢南陽郡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，2020年。

